

讀《吳漁山集箋注》偶得

謝 方*

去年蒙中華書局賜寄章文欽教授新作《吳漁山集箋注》（中華書局2007年6月出版。以下簡稱《箋注》）一厚冊，當時因病後視力不足，未能及時拜讀，最近視力稍好，得以捧讀一過，深覺此書用力之勤、校勘之細、見解之精，堪為近年難得一見之佳作。

吳歷是明清之際的江南才子，又是一位天主教神父，身份特殊。過去人們大都祇知道他是詩書畫俱佳的文士，對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少有瞭解。現我僅就這方面的問題，對《箋注》提幾點補充意見，不當之處，並請箋註者和讀者賜正。

首先是關於“周鐸”是誰的問題。

《吳漁山集·三巴集》中有〈頌先師周鐸〉一首（《箋注》頁199）。陳垣先生認為周鐸應是吳漁山最早的天學師，但西名及生平不詳。《箋注》對此也未有新解（《箋注》頁200）。我認為，這位“周鐸”是最早到江南傳教的一位西方傳教士，應從17世紀來華傳教士的原始文獻中尋找線索。為此，我查了《耶穌會士書簡集》（中譯本，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卷第二十三函洪若翰神父於1703年發於浙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

在我逗留上海期間，曾數次祈禱於以其德行及巨大的魅力著稱的劉迪我神父（Jacques Favre）墓前。

以上所云見該書頁275。這位劉迪我，我前所未聞，由此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應是17世紀後期在江南地區很受人敬仰的神父，這與周鐸的身份相

符，時間也一致。於是我又從《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以下簡稱《列傳》）中找到劉迪我傳（頁293-297），傳中提到劉於1656年來華，在江西遭匪劫受傷，後到江南，在嘉定許夫人（徐光啟的孫女，嫁於松江許氏）家中療傷，此後即在江南地區傳教云云。這一情況正與吳歷初識周鐸的時間、地點相符。因此，我認為這位劉迪我神父很可能就是周鐸。

至於他為甚麼改名，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江南地區文化程度較高，文人入教後就雅稱神父為司鐸：劉迪我的原文名是 Jacques，“周”是第一個字的讀音 Ja 的南方音譯，因此文人就雅稱他為“周鐸”了。周鐸於1676年在上海逝世，但他的墓碑上仍用他原來的中文全名劉迪我，文獻資料記載上也是劉迪我，而他的雅稱“周鐸”也就失傳，無人知曉了。

其次，關於吳歷的第三位天學師，也是最主要的天學師柏應理的介紹，《箋注》則過於簡略。

柏氏在中國傳教二十多年，1681年離華返歐，吳歷受他親炙達十年以上。1680年柏氏擔任中國教區負責人後，即帶領吳歷等兩位中國神父候選人赴羅馬修習神學和拉丁文。但由於吳歷年齡較大，遠渡重洋風險高，怕吃不消，便留在澳門學習拉丁文。但柏應理後來在1692年重返中國途中，卻在上海遇難死去。柏應理在中國不但時間長，且與吳歷學道密切相關，但書中對他在江南的事蹟也少有提及。特別是他寫了一篇許母徐太夫人的傳記帶回歐洲，影響極大，《箋注》中也未提及。

再次，《箋注》中對“羅先生”的解釋，則有明

*謝方，資深學者，原北京中華書局總編輯，曾主持出版《中外關係史叢書》和《中外關係史譯叢》。

顯的失誤之處。吳歷在澳門逗留期間曾賦詩想念不久前離澳西行的“羅先生”，詩中有“不知九萬風濤去，歸向何人說死生”句，吳歷自註謂：“羅先生到大西矣。”《箋注》則說：“羅先生，亦西洋教士，事蹟未詳。”又說，這是“返回歐洲的西洋教士羅先生”（頁173）。這卻是一處明顯的失誤。其實，這位“羅先生”正是地道的中國人，也是數年後由他授予吳歷神父職位的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是也。

其實，本書作者在〈前言〉中已提到為吳歷“祝聖的是一位華籍主教羅文藻”（頁8），但卻未將他與《三巴集》詩句中的“羅先生”聯繫起來。吳歷在澳門時很可能就已瞭解羅先生到羅馬是接受中國教區主教職位的，所以看到風暴驟起，自然而然地便想念到西行途中的羅先生是否已抵歐洲？

羅文藻的事蹟不見於《列傳》中，因為他是“多明我會”中的教士，不是“法國耶穌會”中的教士，所以《列傳》中沒有他的事蹟。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光啟社出版，頁335-347）中對羅文藻則有詳細的記述，可以參看。

最後，還有一位江南地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女基督徒，對吳歷的棄儒歸教也很有影響的許母徐太夫人，《箋注》中未見涉及。她出自名門上海徐家，又嫁給松江望族許氏，享年七十三歲，人們都稱她為許母徐太夫人。當時在江南地區傳教的歐洲神父，包括劉迪我、魯日滿、柏應理前後三位吳歷的“天學師”，都受到她的熱情關懷和無私奉獻。柏應理返回歐洲後，用拉丁文寫了一篇〈中國信教夫人許甘第大傳〉（“甘第大”是她的教名），在歐洲流傳甚廣，後來上海徐家匯印書館又譯為中文出版。當時傳教士把江南地區視為播撒基督教種籽的天然沃土，這是與許母徐太夫人的幫助和影響分不開的。許母徐太夫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還可以舉一例。據《列傳》之〈柏應理傳〉中稱：

應理赴羅馬時，許太夫人曾以金爵一及聖飾品若干囑其代獻於聖依納爵禮

拜堂中。松江信教婦女爭以戒指、手鐲製此類飾品。許太夫人別以獻物囑其供獻於果阿城聖方濟各墓前，並以本人及其諸女所製之刺綉分贈各教堂。（……）許太夫人知應理必須進謁教皇，曾囑其購取諸傳教士之華文撰述四百餘種以獻。聖座得之甚悅，命藏教廷圖書館。（頁312-313）

按這四百餘種中文文獻現已成為梵蒂岡圖書館中最珍貴的中文文獻典籍。19世紀後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大多得益於梵蒂岡圖書館內這批中文文獻。許母徐太夫人（1607-1680）與吳歷既是同鄉，又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二人都是高壽，徐母七十四歲，吳歷七十七歲，共同在世時達四十八年）。吳歷的三位天學師都受到徐太夫人的特殊幫助和照顧，但《箋注》中未提到她，似也是一欠缺。1970年臺灣光啟出版社出版了方豪神父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其中就收入了〈許母徐太夫人傳〉，2003年上海光啟社曾重印此書，可以參考。



程祖慶《練川名人畫像》之吳漁山像